

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的唯識學詮釋

／ 竇敏慧

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

本研究主題乃是從玄奘譯《說無垢稱經》與支謙本、羅什本、梵文抄本的對比，鋪陳至窺基《經疏》在漢譯《維摩詰經》的疏解史上展現的「唯識學疏解架構」、「維摩詰經觀」和「唯識與如來藏交涉」，理解唯識宗在《維摩詰經》上的詮釋意識。

本研究主要探討內容，可分為：

1. 《維摩詰經》三家漢譯本非「同本異譯」；2. 窺基的《經疏》架構；3. 窺基的「維摩詰經觀」；4. 《經疏》內如來藏與唯識交涉；5. 方法論的反省。

此外，亦針對三家漢譯本與窺基《經疏》的唯識學思想方面，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，以期更進一步深入研究之。

第一節 《維摩詰經》三家漢譯本

做為漢地流傳甚廣的一部經典，《維摩詰經》曾經過七次漢譯，但現在僅存：三國吳支謙於西元 222-229 年間所譯的《維摩詰經》、西元 406 年姚秦鳩摩羅什所譯的《維摩詰所說經》三卷本，以及西元 650 年、唐代玄奘譯的《說無垢稱經》玄奘本，合稱三家漢譯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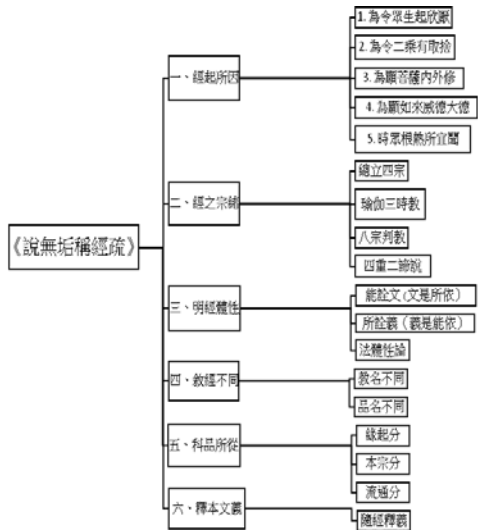
此三家漢譯本與梵文抄本的對比中，發現歷史上記載「同本異譯」的情形，與現實情況不相符。在字數方面，以玄奘本字數最多，支謙本字數最少；在法數方面，以玄奘本的法數最多，支謙本最少；在菩薩名方面，玄奘的菩薩名與梵文抄本多能相對應，但支謙本與梵文抄本、羅什本和玄奘本有顯著的差異；另外，著名的「默然無諍」情節只出現在羅什與玄奘的譯本，支謙本僅以文殊師利菩薩為諸菩薩的不二法門簡要作結。由此可知：三家漢譯本之間，翻譯上的差異有可能來自底本的不同，而不一定是翻譯者對梵文的理解問題。從比對現存梵文抄本、羅什本、玄奘本與支謙本的差異中，也許能略窺得 3 世紀時《維摩詰經》的遺跡。

三家漢譯本雖非「同本異譯」，但文法脈絡上大致相同，可做為對比玄奘本中「唯識術語」的先決條件。

玄奘三組唯識字「vij-apati/vij-ḥna」、「b'ja/gotram」和「ḥ」在《說無垢稱經》中，並不具有唯識義。從三家漢譯本與梵文抄本的比對中，可見玄奘將-譯為「了別」，-ḥ譯為「識」，符合初期大乘思想說五蘊的立場；「b'ja/gotram」雖翻作「種子/種性」，卻只是指植物種子和成佛的可能，並未涉及唯識學種子義與種性論；梵文抄本中的ḥ，意指「所藏」，玄奘把ḥ音譯為「阿賴耶」，純粹是出於個人學思背景的习惯，而非真有唯識學在內。因此可證明玄奘並未在翻譯《說無垢稱經》時引渡唯識思想，僅僅是某些字詞上、基於個人的學思背景，採用了唯識學的術語，並未影響整體《維摩詰經》的思想。

然而，在《經疏》中，窺基雖與玄奘相同，將vij-ḥna釋作「心識」，vij-apti是「了別」。但他從瑜伽行派的觀點，將「心識」說為可了別外境的「第八識」，不符合五蘊的「識」。且以法相宗的角度將「b'ja種子」疏解為發正等覺心的「煩惱種子」；「gotram種性」則是做為「行佛性」和「理佛性」，提出《說無垢稱經》所說的「生死種子焦敗」，即是「定性二乘」不能成佛之因。納入唯識學的「本有無漏種子義」和「五性各別說」。又將ḥaya加入「執藏」的意涵，視作阿賴耶識，不完全依梵文本意「所藏」之意解釋。可見窺基依於玄奘譯本，卻溢出了玄奘的翻譯，增添入唯識思想的疏解傾向。

窺基在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內所建立的「唯識學疏解結構」可簡化為下圖：



窺基標明「寫作動機」為說法的目的、聽法的眾生和說法的時間三個部份。顯示此法訴說於恰當的時間，能有益二乘眾生內欣佛身、外欣淨土，斷除分別心的目標，並且藉由穢土轉淨彰顯菩薩修行的功德，展現如來的神力廣大。在「判教」上，雖然淨影慧遠、智顛、吉藏都以自宗的立場判釋《維摩詰經》，但大抵不離「中觀」。窺基則將《說無垢稱經》判為唯識宗三時教中的「第二第三時」，從說法空過渡到並說空有；八宗判釋以第七宗勝義皆空為主，卻也依第八宗應理圓實宗。可見窺基採用唯識宗的立場，判定《說無垢稱經》具有空觀和唯識兩種思想並存的經典。

「經體」和「教體」區分為清辨和護法的說法。清辨的「經體勝義諦」和「經體世俗諦」相互理解，只有「經體勝義諦」可被解釋為「教體」。護法的「經體勝義諦」和「經體世俗諦」都可被解釋為「教體」，詮釋真如、心識、實相和假法在《說無垢稱經》中的作用。可見窺基對《說無垢稱經》的認知是先舉出中觀為例，再說明中觀偏空，唯識方能展現空有的立場。

第二節 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的觀點與立場

窺基的「維摩詰經觀」可分述如下。在「解脫觀」中，「不可思議自在神變法門」以「不可思議」為諸法門的體性，點出《說無垢稱經》中「神通」的特殊地位。整部經典由「神通」貫串，彰顯說法的殊勝與渡化眾生的種種法門。其作用與「默然」相同，體現了窺基的「文字空觀」，是超越言語、認知的境界。同時窺基以空、識、非空解「方便解脫」的「行相」；以如來藏說解脫的「凡聖心」。在「方便解脫」方面，窺基分出「解脫八門」，大量引用了唯識經典。他以空、

識、非空解「方便解脫」的行相；以如來藏說解脫的凡聖，雜揉了般若和唯識的思想，雖說空也說有，符合他對《說無垢稱經》的判釋立場。

做為《經疏》內的「唯識法門」，「佛土觀」則扣合《說無垢稱經》的「心淨土淨」，彰顯穢土的菩薩功德時也向眾生揭露淨土的生因，與轉識成智、轉染成淨的唯識學說法一致。窺基引用「直心」、「深心」做為眾生往生淨土的發心動力，推論菩薩自心清淨，使眾生亦淨，一切清淨後，即見淨土。

窺基的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將清辨的「空理義」與護法的「應理義」相對論述，展現中觀的「勝義空」和唯識的「勝義有」對於「空性」的論述，並取護法的「勝義諦」為勝解。《說無垢稱經》直觀地空除眾生對外物象的實有認知的中觀立場，與唯識學認識論的「三性說」相配合，提出「應理義」，說明「依他起」、「遍計執」在《說無垢稱經》中的作用，以及最終的真理顯現是「勝義有」的「真如無我性」。窺基所舉出的「四重二諦說」中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屬於「說我法空」的「初世俗諦」；而「勝義諦」四法門相互涵攝，顯見各思想間溝通的可能。然而，清辨之說只見「空」，不見「有空有有」，故判護法「不有不無」為勝義諦。護法的「不有」是遍計所執性；「不無」是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。可見窺基有意識地將唯識學納入《經疏》中，將原本「破而不立」的《說無垢稱經》轉向肯定「真如」的「無我性」是「勝義有」。無論是「解脫法門」、「心淨土淨」、「默然無諍」，都依循著先肯定清辨空理義的「空性」，再顯示護法應理義中「真如」的「勝義有」，展現窺基如何以唯識學疏解架構操作於一部以「空性」為主的經典的進路。

此外，在佛性論議題上，《說無垢稱經》所說的「如來種性」做為眾生皆可成佛的可能，卻因為諸聲聞阿羅漢缺乏「生死種子」而無法發起大乘心，正好符合窺基主張的「五姓各別說」，「定性二乘」不可成佛。為了加深疏解的合理性，窺基提出「如來藏／阿賴耶識」為「理佛性」和「本有無漏種子」為「行佛性」。然而，窺基將阿賴耶識等同如來藏，乃是只取共同的清淨結果，將煩惱視為客塵，排除了阿賴耶識能攝染法的特質，將「心」視為不斷運作的自性清淨心，並非唯識學的所緣的凝然真如。這樣的解釋，顯然是超出玄奘的學說之外，且不切中《說無垢稱經》

的核心。將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相互解釋，並承認如來藏是建立一切法的根本和成佛之因的論述，表現出中國佛教中，唯識學和如來藏的相互融合的傾向。

第三節 方法論的反省

在疏本研究的過程中，詮釋學被用來理解疏解背後的意義脈絡。試圖在讀者從疏本觀看經典本身的同时，指出疏本本身可能帶有的前見。

玄奘並沒有在唯識術語中納入唯識思想，因此，《說無垢稱經》並非「語言的遮蔽性」或「語言的解蔽性」的展現。《說無垢稱經》藉由語言的中介理解文本的意義，但在窺基的《經疏》中，只能作為「前有」看待。真正使窺基採取「唯識學疏解架構」的是他的「前見」。

窺基的《經疏》與其說是受到玄奘譯本的語言影響，不如說是自主地採取唯識學的疏解方式。從「空理義」中明顯看出窺基對於《說無垢稱經》的「空性」把握十分精準，然而最終以唯識角度的「應理義」為「勝義諦」，顯然是基於宗派教義而做的決定。

在窺基的《經疏》中，「時間距離」淘洗後發現它不盡然是一部《維摩詰經》的疏解，而更著重於對法相宗「唯識學疏解架構」應用的保存。若是只從「文本」和「詮釋」中觀察經和疏的關係，可能錯過了大環境的歷史作用。因此，透過伽達默爾的詮釋學，發現窺基的《經疏》和玄奘的《說無垢稱經》有不同的理解方向，但兩者都通過「時間間距」，成為「歷史流傳物」，可知疏不一定要和經朝向共同的目標，窺基不一定要和玄奘一樣，致力於對《維摩詰經》經義的完全把握，它可以是一個新的解釋。

因此，在閱讀中國佛教的疏解本時，不能只從經典原意的表達解釋疏本流傳的必然關係，後者很有可能是為了其它原因而存在。當讀者過於相信疏本表露了真實的經文意義，只會落入疏解者的「前見」中。故而，比起語言的問題，漢譯佛典的疏解更應注意背後宗派的目的性與方法論。此目的突顯詮釋者的「前見」，方法論則是詮釋者背後的宗派意識展現。

從玄奘的《說無垢稱經》和窺基的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可看出：即使疏解者親自參與翻譯的過程，強調準確翻譯的重要性，其疏本仍然可能帶有強烈的前見。或許可以歸納出：中國佛教的疏解本，因為宗派意識的緣故，不僅是對經文的解釋，更是進一步對宗義的引證。若是只從文本和詮

釋中觀察經和疏的關係，可能錯過了佛教思想史上整體的歷史影響。因此，疏解不一定做為經典意義的充實，它可以是新的詮釋，也可以做為中國佛教發展史的流傳物。

第四節 結語

窺基《經疏》展示自身的「維摩詰經觀」，試圖將一部中觀經典詮釋成唯識學，從中以「應理義」攻訐「空理義」的不足。並且窺基也越過法相宗的範圍，將如來藏思想納入佛性論補足「五性各別說」眾生遍滿的佛性。然而，對於漢譯《維摩詰經》疏解史可能僅是短暫的一瞬。隨著法相宗勢力的削弱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和《經疏》，即限制於法相唯識的範圍中，僅是玄奘一系的思想的展現。

基於《維摩詰經》的梵文底本已然佚失，本研究受限於文獻資料的不足，只能以十二世紀的梵文抄本為參照。對於《維摩詰經》三家漢譯本的翻譯問題，或許須更關注敦煌文書所遺留的當時的殘卷。關於漢譯《維摩詰經》從南北朝到隋唐所形成的諸家，乃是展現當時各宗派藉《維摩詰經》表現的宗派議題，可找出其中相互函攝的觀點，進一步梳理為詮釋譜系。另一方面，窺基的「唯識學疏解架構」的操作方式，是否也被應用於其他疏本中？可從中探討他對初唐法相唯識的思想如何理解與應用。

漢譯佛典在詮釋過程中，與西方詮釋學的方法論反省帶給佛學研究新的方向。然而，詮釋學者立足於不同的宗教背景，其說是否全然合乎佛教研究的特質，還須謹慎把握。窺基的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在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論中僅是眾多解釋中的一環，自此形成的效果歷史也將成為後人理解《維摩詰經》的前理解結構之一。因此，不能因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立於法相宗的角度便全然排除其對於《維摩詰經》詮釋的有效性。詮釋學哲學著重在詮釋過程中尋找到比當下自我更超越的存在，所謂真理也是不斷地對話中趨近。窺基《說無垢稱經疏》給予讀者另外一種觀點，若從詮釋學看來，亦是完整了詮釋活動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。